



网站首页
文学百科

关于本所
论著评介

最新动态
学术回溯

学术要闻
所办刊物

科研成果
新书上架

科研教育
热点关注

当代作家作品
外国文学研究



站内搜索 SEARCH

关键词:

栏目:

全部栏目

搜索

当前位置: 所办刊物 > 外国文学评论 > 文学新闻

外国文学评论

※ 本刊简介

※ 历刊目录

※ 主编寄语

※ 文学新闻

福柯《疯癫史》被指“史料基础薄弱”

众所周知,《疯癫与文明》是福柯成为20世纪最重要科学史家之一的奠基之作。但此书并不是他的第一部著作。他的处女作*Maladie mentale et personnalité*(《精神病与人格》,1954年)的篇幅要小得多,他以此书为基础完成的博士论文*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疯癫与非理智:古典时期的疯癫史》,Plon版,1961年),将原先不足300页的论著扩充了一倍多。此书于1964年出了一个缩写本,即今日坊间广为流行的《疯癫与文明》,这个本子其实仍以早年的《精神病与人格》为底本,略微增加了一点新的内容。但1965年英译本的译者理查德·霍华德改用了更醒目的书名“*Madness and Civilization*”,新命名大大促进了福柯这部论著——特别在英语学界——的普及,然而Tavistock出版社1972年要再版《疯癫与文明》时,却还是遭到了福柯的强烈反对。他究竟因“悔其少作”,还是希望看到《疯癫史》的一部全译本,坊间则留下了许多猜测。这一年,法国伽里玛也再版了福柯这部大作,他于是借此机会将Plon版的书名压缩,改为*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Age Classique*(《古典时期的疯癫史》),另外,他撤下了第一版的导言,并为此写了几句话,说明此举的理由。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版增加了两篇附录,一篇是福柯在1964年发表的一篇短论文,另一篇是他对德里达的一个批评的回应。不过,当伽里玛于1976年另出一版、即所谓的Tel版时,他又把这两篇附录撤下了。

福柯在英语学界被接受,应该说很大程度上还得归功于当时著名苏格兰精神分析学家莱恩(R. D. Laing)的大力推荐。莱恩在给出版社的信中说福柯的这部著作“不同凡响,……写得极好,思想非常严谨,其主旨将彻底动摇传统精神分析学的假设”。在当时,莱恩的认可是相当起作用的。

与福柯的《疯癫史》相比,英译缩写本《疯癫与文明》删削了好几章的内容,砍去了法文版中的一千多个注释。这样的篇幅几个小时即可读完,若有人要质疑福柯何以将偌大的一些结论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之上,那也很容易说上一句法文本要厚重、全面得多而加以打发。福柯此著描述了一个完全颠倒了的世界:他否定了精神分析学自诩的与社会进步的联系;否定了关于疯癫和现代社会的那些已经得到认可的智慧。过去的一代又一代人,把“疯人”从正常的人群中择出并送进疯人院,把“疯癫”作为医学科学的研究对象,人们对此大唱赞歌。福柯则提出截然相反的解释:他认为失去理智者从迷信的桎梏和放任不管的境遇中获得“解放”,不啻是一种“出于道德理由的大禁闭”(a gigantic moral imprisonment)。不过,英语学界的一些学者认为,福柯的这种疑古精神之所以在此后40年的精神分析学历史撰写中能占据主宰的地位,更多的还是由于这位法国人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其实在60年代的时候,英国本土怀疑论的苗头也已经数不胜数,它们也都在化解着所谓精神分析学是一种让人获得解放的科学的看法。所以,公允地说,精神分析学历史修正说的出现,应该说是由许多助产士共同推动的产物,而福柯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已。但令人不解的是,既然福柯在法语世界和英语世界都占据了那么重要的地位,他的这部法文版的奠基之作为什么却迟迟没有人来把它完整地翻译成英语,而英语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们又为什么长期以来竟能听任这部著作被边缘化而没感到有全文阅读它的必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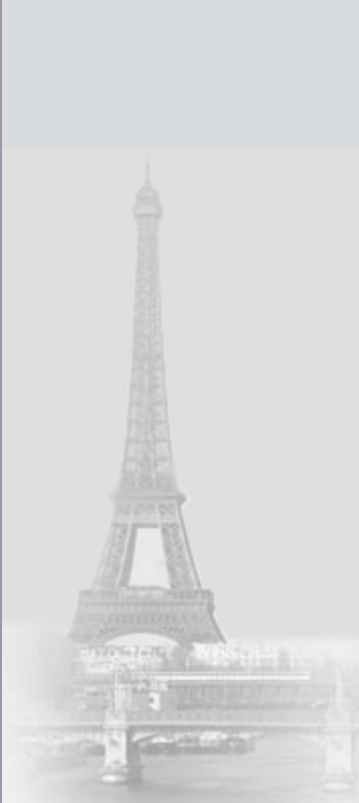
现在,这一页终于翻了过去。Tavistock的继承者Routledge于去年8月推出了由乔纳森·墨菲和让

• 卡尔法合译的、长达725页的《疯癫史》英文全译本。这一次的全译本不仅补足了原来被压缩掉的所有章节，如对于“进入近代时的教养改造问题”的考察，对于在全欧突然出现的“隔离院”的考察，关于“古典时期疯癫经验的种类和变化”的讨论，关于18世纪医学界和有识之士们对疯癫的探讨和认识的考察，等等，而且还将福柯为法文版《古典时期的疯癫史》第一版和第二版撰写的导言，以及福柯对德里达质疑的回应等都收罗进去，这样，译本的总篇幅就比过去扩大了一倍多，注释则足足增加了10倍！从《疯癫与文明》到现在这部《疯癫史》，英语学界竟等候了将近半个世纪！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变化之速，真是难以逆料！《疯癫史》出版后，虽说也有几声叫好的，但它在英语学界迎来的第一篇重头书评，其标题居然是：“愚人之学：福柯纪念碑的脆弱基础”（“Scholarship of fools: The frail foundations of Foucault's monument”，见《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LS*, March 23, 2007）。

发难者安德鲁·斯卡尔（Andrew Scull）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社会学教授，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起一直从事精神病、精神分析学与社会形态关系的社会学研究，著有《疯人院》（*Museums of Madness*, 1979）、《社会的秩序与心理的无秩序：历史语境中的英美精神分析学》（1989），《疯癫与社会：1700—1900年的英国》（1993），《18世纪英格兰的疯癫病医护探索》（2001，与J. Andrews合著）以及《疯人院：夸大狂与现代医学的悲剧》（2005）等一系列在本领域颇具影响的著作。

首先，在斯卡尔看来，时隔将近半个世纪《疯癫史》的全译本才得以出版，这并不能证明法语学者在英美地位的提高，恰恰相反，这一事实本身却反映了这些年来人文学者语言能力的下降和相互之间隔阂的增大。墨菲和卡尔法的全译本与早先理查德·霍华德的译本相比，斯卡尔认为新译在文字上非但没有胜出，反而经常让人感到“沉闷”（dreary）和“缺少精气神”（dispirited）。而更令人沮丧的是，即使这么个不长脸的翻译，却也不能为福柯建立其理论所依靠的证据掩丑遮羞。这一千多个原先没有翻译的注释，现在白纸黑字都摆了出来，斯卡尔说，这个场面总的来说不那么漂亮。

斯卡尔认为，福柯的《疯癫史》中所采用的材料都比较粗浅，不少属于过时的信息。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所做的这项研究，大部分都是他在“智性流放”到瑞典乌普萨拉期间完成的。在那里，他接触了英、荷、法、德等国大量的医学文献，接触了笛卡儿、斯宾诺莎等主要哲学家的著作，但他显然没有看到这些国家学者们的最新研究资料。在《疯癫史》第一部分的399个注释中，只有28个是对20世纪学者的引征，相对应的参考书目中只有25项是1900年以后的，仅有1项是二战以后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的参考书目中只有一部20世纪的文献，第三部分中仅11项成果是20世纪的。英文全译本中增补的章节表明，他基本上是采用了上述比较陈旧的文献来分析古典时代的疯癫问题。他的关于禁闭习俗的内在机制和逻辑的表述，也基本上是照抄上述文献中所记载的一些既定原则和条规。可是，斯卡尔强调指出，这些文献记载与那些地方当时的实际状况是有差距的，若以为这些笼统的原则即已提供了当时的日常生活逻辑，那其实是很天真的。福柯所给的注释中有一些有法文档案的出处，但这些材料从未有人系统、合理地使用过，因此也不清楚它们与真实状况有多大的差距。福柯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档案材料为什么被选用，他选用的标准是什么，他是如何从中发掘出事实的，他所举的例子又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等等。斯卡尔说，比较历史学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别人的研究成果，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对福柯以精心挑选的法国的例子作为整个西方世界代表的做法还不能断然抹煞，但是，在他的一些最著名的段落中，他一再依靠陈旧过时的二手材料来源的做法，他在阅读这些材料时的粗心大意或凭空想象等，则显然是应该受到责备的。例如，福柯断言，1815—1816年英国下院对英格兰疯人院的调查显示，贝德勒姆（即Bethlem）在每个周日将收容者集合作公开的展示，参观者只要每人缴费一个先令即有权观看，而每年前来参观的人数达96,000人次之多。然而，斯卡尔说，真实的情况却是，调查报告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记载。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公示和参观（它原先也根本不是限于周日）早在1770年时就已经被贝德勒姆皇家医院的总监禁止了。而即使在此之前，那所谓的额定参观费之说，其实也是莫须有的杜撰。是福柯自己把贝德勒姆的历史搞错了。他据此而提出一个惊人之说，声称“自从贝德勒姆精神病诊所于1733年开办、将那些毫无希望的病人收容以来，伦敦医院就与法兰西总医院，或与其他任何的疗养院等，再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了”。他在书



中还谈到贝德勒姆于1676年的“重修”，而事实是，就在那一年，该院刚刚从毕肖普斯盖特的一个修道院中迁到了莫尔菲尔德由罗伯特·胡克设计的一幢很气派的大房子里。在福柯的叙述中，“修道院”一词频频出现。他说英国大多数的大型疯人院都是过去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斯卡尔认为，这在不可思议。因为英国古典时期压根儿就没有上规模的疯人院，英国的大型疯人院是直到19世纪才出现的，而且，在所有17—18世纪出现的疯人院中，唯有贝德勒姆疯人院是建在早先的修道院里，而它最多也只收容了不到50人，根本达不到福柯想象中的所谓“大型疯人院”（grands asile）的规模。另外，斯卡尔强调指出，福柯仅仅依靠了乔治·尼科尔斯爵士、E. M. 里昂纳德和F. M. 伊顿的三部过时的著作来讨论英国和爱尔兰的济贫法问题，那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而《疯癫史》中的大量例子表明，福柯显然与他当时的学术界脱节隔离，所以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整整一个世纪的研究都没有产生对他的课题有意义、有价值的成果。为此，斯卡尔认为，福柯的这项精心的学术架构建立在一个极其脆弱的经验基础之上，所以难怪会频频出错。

在《疯癫史》英译本的封底，有位名人写了这样一句推荐语：“今天，英语读者终于有机会深入到福柯所做分析的背后，窥见其学识的底蕴了。”斯卡尔对此发表感言说：的确如此，希望他们认真地读一读，动动脑筋，他们定能从中获得一些教训，而其中一个有意思的教训就是：“历史竟能如此轻易地被某个愤世嫉俗的无耻之徒歪曲，事实会被他忽视，对人类理性的张扬也被他贬损和摒弃，而他所凭借的则是他的顾客们的无知和轻信。”

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网站导航](#) | [意见反馈](#) | [投稿指南](#) | [联系我们](#) | [招聘英才](#) | [最新招聘启事](#)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数字信息室 邮编：100732